

连续 31 年中国外长新年首访选择非洲

中非命运共同体将更加紧密

1月4日,中国外长开启第31年新年首访非洲。此次访问5国分别是尼日利亚、刚果(金)、博茨瓦纳、坦桑尼亚、塞舌尔,分别位于非洲西部、中部、南部、东部和印度洋海域。今年中非双方还将召开三年一度的中非合作论坛会议,因此此访也将为未来三年的行动计划凝聚共识。那么中国和这些国家在哪些领域有合作,未来又有哪些新的合作前景?

尼日利亚:中国在非洲的第一大工程承包市场

尼日利亚位于西非,目前是非洲第一大经济体(2019年GDP为4753亿美元),经济总量全球排名第26位。同时,尼日利亚也是非洲第一大石油生产和出口大国,欧佩克成员国之一。因此,石油业是尼日利亚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

不过由于国内炼油能力较低,仍有85%左右的国内成品油消费需依赖进口。除了炼油业,其他领域产业发展也相对滞后,电力供应严重不足,据外交部资料显示(数据时间截至2020年10月),现有装机容量1040万千瓦,实际最大发电能力507万千瓦,仅不足四成家庭通电。钢铁行业,全国有3座钢厂,年产量仅1万余吨。

尼日利亚当前正着手制定《2050年尼日利亚议程和中期国家发展计划(MTNDP)》,根据新计划,尼日利亚将于2030年前使大约1亿尼日利亚人摆脱贫困。根据世界银行预测,到2050年,尼日利亚人口将超过4亿,成为仅次于印度、中国的世界第三大人口大国。应对人口过快增长,促进就业与经济发展问题成为尼日利亚未来发展的头等大事。

因此,在石油、基础设施、脱贫等方面,中尼之间有着较大的合作空间。目前,尼日利亚是中国在非洲的第一大工程承包市场,领域涵盖铁路、公路、房屋建设、电站、水利、通信、打井等领域。

刚果(金):世界原料仓库

刚果(金),位于中非,是联合国公布的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之一,2019年GDP为473.2亿美元。农业、采矿业占经济主导地位,加工业不发达,粮食不能自给。不过自然资源丰富,素有“世界原料仓库”和“地质奇迹”之称。全国蕴藏多种有色金属、稀有金属和非金属矿,其中铜、钴、工业钻石、锌、锰、锡、钽、锗、钨、镉、镍、铬储量颇为可观,在世界上占有重要地位。铁、煤、黄金、银等储量也很丰富,还有白金、铅、磷酸盐、硅酸盐等。

很多中国矿企,如紫金矿业、洛阳钼业、金川集团等都在当地有合作项目。比如,全球储量最大、品位最高的铜钴矿资源之一的Tenke Fungurume铜钴矿,洛阳钼业拥有65%的股权。根据洛阳钼业公告,Tenke拥有超过2800万吨铜和300万吨钴的资源量。其中钴在锂电池、飞机发动机、永磁材料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世界第二大品位的地下活性铜矿Kinsenda地下铜矿,金川集团拥有77%权益。

在经贸领域,2015年1月起,刚97%输华商品享受零关税待遇。2019年5月,刚中央银行批准人民币进入刚外币流通体系,并授权有关商业银行在刚开展人民币结算服务。

博茨瓦纳:希望中国企业到博茨瓦纳投资

博茨瓦纳是位于非洲南部的内陆国,2019年人口230万,GDP183.41亿美元,是非洲经济状况较好的国家之一。钻石业是其经济支柱,产值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畜牧业是传统产业。制造业落后。旅游业近年来发展较快,成为新兴产业。

中博两国签有贸易协定。2019年,中博双边贸易额为3.19亿美元,同比上升7.67%。中方主要出口纺织服装、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等,主要进口的则是钻石。不过博茨瓦纳驻华大使莫图西·帕拉伊在去年3月份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坦言:“我们不想只卖钻石,也想升级产业。”

农业是很多博茨瓦纳人赖以生存的基础性产业,但目前博茨瓦纳的农业现代化水平还不高,希望与中国的合作提升博茨瓦纳农业发展水平。帕拉伊说,“2018年莫克维齐·马西西总统访华后,博中两国在很多领域的合作加速推进,我们正在探讨将博茨瓦纳牛肉出口到中国的可行性。”帕拉伊还希望中国企业到博茨瓦纳投资。

坦桑尼亚:加强基础设施、农业、制造业等领域重点合作

坦桑尼亚位于东非,全国总人口为5910万(2018年),GDP仅为636.58亿美元(2019年),是联合国宣布的最不发达国家之一,和其他国家类似,坦桑尼亚矿产资源也非常丰富,水力资源丰富,发电潜力超过4.78亿千瓦;森林面积约4400万公顷,占国土面积的46%,出产安哥拉紫檀、乌木、桃花心木、烤树等。

去年10月26日,中国与坦桑尼亚达

成协议,开始从该国进口大豆产品。

基础设施、资源开发、农业、制造业、旅游等领域也是两国合作的重点领域。去年12月15日,习近平主席同坦桑尼亚总统马古富力通电话便提到了这些合作领域,此外马古富力还表示,愿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

塞舌尔:基础设施援建

塞舌尔位于马达加斯加岛东北部的印度洋海面上,全国总人口只有9.8万,GDP17亿美元。塞舌尔以旅游、渔业和少量手工业为主。塞舌尔渔业资源丰富,鱼类产品位居出口商品首位。旅游业则是该国经济第一支柱,创造七成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2013年,中塞双方相互互签。

塞舌尔1976年6月29日独立,第二天(6月30日)便和中国建交,建交以来两国关系发展顺利。

中国从1977年起开始向塞提供各种援助,为塞援建了司法大楼、议会大楼、标准局大楼、国家游泳池、安塞罗亚莱医院、综合工艺学院、蒙弗勒利中学、扎拉孔湾小学及幼儿园、格拉斯小学和幼儿园等30余个项目。

目前该国唯一一所综合性大学塞舌尔大学,成立于2009年,前身便是中国援建的综合工艺学院。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1月11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非双方将致力于加强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刚果(金)和博茨瓦纳在此访期间分别同中方签署共建“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我们愿克服疫情影响和外部干扰,与非方聚焦基础设施建设,支持非洲自贸区建设,优化产能投资布局,加强科技国际合作,助力非洲实现互联互通、工业化和跨越式发展,培育中非大市场。

(一带一路网)



南亚经济「寒冬」盘踞

哥斯达黎加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

哥斯达黎加国家能源控制中心的数据显示,2020年哥斯达黎加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全国发电总量的比例达到

99.78%,化石燃料发电量创1986年以来最低纪录。

分析认为,气候多雨、人口较少、



工业化程度较低,为当地利用可再生能源提供了有利条件。根据哥斯达黎加国家电力电信公司数据,2018年哥全国总装机容量为3610兆瓦,发电总量为11355.45吉瓦时,98.6%的电力来自可再生能源。目前,水电是哥斯达黎加电力的主要来源,占比近72%,地热能、风能、生物质能和太阳能是补充能源。可再生能源电力供给网络几乎覆盖全国。

哥斯达黎加以热带雨林气候为主,每年雨季长达七八个月,降水十分充沛。数十年来,哥斯达黎加持续在全国投资建设水电项目,建成了多个大型水库、水电站和数百公里的输电线路。

随着民众环保意识持续增强,政府开始积极推广能源多元化。1996年,哥斯达黎加启用风能发电,2012年建成第

一座太阳能光伏发电厂。近年来,私人资本进入电力市场,具有私营性质的农村能源合作社兴起,通过自建水电站、风电站满足当地能源供给。

2019年,哥斯达黎加发布《国家脱碳计划》,提出到2030年实现100%可再生能源发电,到2050年实现温室气体零排放的目标。依照该计划,公共交通工具的电动化率在2035年将达到70%以上,2050年实现全部电动化。哥斯达黎加政府目前正通过税收优惠鼓励民众购买电动汽车,并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充电设施,优化公共交通设施和网络。

美洲开发银行和哥斯达黎加环境部的一项研究表明,哥斯达黎加《国家脱碳计划》的实施,将在今年30年为哥斯达黎加带来410亿美元的净收益。

(本报综合报道)

新冠疫情下供应链重构对基础设施提出新要求

联合国贸发会议的《贸易与发展报告2020》认为,2020年全球经济进入困境。由于许多国家并未对新冠疫情做好防控准备,只好采取封锁的做法。经济危机像病毒一样快速传播,可能达到类似于1930年大萧条的水平。国家间的经济表现差异明显,面对公司破产、供应链破碎、信心动摇、需求减弱、债务高企,若无法有效应对,可能会导致“失去的十年”。面对新冠疫情本身发展的不确定性,既要把握变化的特点,注重相应的公共卫生措施和导致的国际经贸形势变化给企业带来的新环境,也需要找出不会因疫情发生变化的稳定因素,危中寻机,积极应对。

后疫情时期全球经贸合作的“五个不变”

疫情发生以来,全球经贸合作出现了大幅萎缩,贸易和投资规模下降,经济普遍不景气。但决定全球经贸合作的主要因素并未因疫情发生改变,此类不变因素对分析和判断未来全球经贸合作的趋势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一是各国资源禀赋和产业结构短期内不会改变。国际贸易和跨国产业分工理论认为,国与国之间的经贸关系各自参与贸易投资的能力和意愿为基础。例如,矿产资源丰富的国家往往以采矿和原料加工为重,劳动力丰富的则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疫情冲击的主要是公共卫生防疫能力,各国经济的供需并未因疫情而出现不平衡,而短期内产业结构也不会发生较大调整。

二是多数经济体维护自由贸易和现行国际规则体系的意愿没有变。国际经贸规则由各国通过长期磨合而形成,在保障国际经贸活动有序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各方通过接受、学习和参与自由贸易体系参与全球产业链合作,如果放弃现有规则,那么将造成巨大的成本损失。

三是多数国家以经贸合作而非发展

大而全、小而全产业链体系的方式不会变。大国有可能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而多数国家由于缺乏必要资源,不具备全产业链基础,难以发展完整的产业体系,对于国际贸易和分工的相互依赖将成为其选择的主要发展模式。

四是技术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向前推动仍为主流。技术在人类社会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增强人类改造环境、提高生活水平和质量的能力,降低发展的成本。尽管当前环境下出现技术封锁、打压等不和谐的声音和行动,但从各国发展的基本模式上,技术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仍是主流。

五是知识、智力密集型产业的投资回报率更高。尽管疫情对诸多产业的运营和交易模式造成较大冲击,加速了产业调整与升级的进程,但包含更多知识含量的产业领域仍然更有收益保障。

后疫情时期全球经贸合作的“五个变化”

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十分显著,部分影响因素的变化可能是长期的。对有关因素的把握有助于更好地分析后疫情时期全球经贸合作的发展特点,从而做出积极回应和调整。

一是包括农产品、制成品在内的全球供应链、产业链结构可能受疫情和贸易保护主义影响而被迫进行调整。疫情爆发以来,包括美国、欧盟、澳大利亚、日本等经济体均采取了鼓励产业回流、限制外资并购等政策举措,加强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力度。受疫情防控措施限制,供应链断裂和产业链重构的情况更为普遍,产业发展环境稳定、要素供应充足的国家和地区可能因疫情提升国际竞争地位。

二是公共卫生领域的安全关切更为突出,国际治理与经贸规则体系发生改变。与历次全球公共卫生事件的冲击相似,新冠疫情的跨国性以及伴随疫情控制、防疫物资交易和疫苗研发使用等进

展促使国际治理体系相应调整 and 适应。部分国家可能以其医疗领域的优势为砝码,争取更为强势的话语权。

三是数字经济领域的市场需求驱动环境变化。疫情爆发后,在线服务市场快速发展,以跨境电商、网络会议、线上教育等为代表的数字经济驱动动力强劲。数字领域的服务能力重塑市场环境,迫使能够适应并做出响应和调整的市场主体获得更强的发展动能,“数字鸿沟”的出现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各国市场发展的能力差异。

四是技术领域的全球化可能更为明显,产生长期后续影响。技术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因疫情得以进一步加强。部分国家为保护自身技术优势所采取的限制技术出口和打压其他国家“冠军企业”的做法将可能形成分化的技术体系,从而导致相关产品和服务的分化,降低经济复苏和社会福利。

五是交通运输方式和地区贸易格局将在疫情后加快调整。产业链和供应链的调整正在加速。按照联合国贸发会议的研究,当前全球的产业链主要集中在技术含量较低的纺织服装等行业领域,而制造业的供应链多为局部且集中在北美、欧洲和亚洲三个区域,供应链虽已经历10余年调整但迄今仍未恢复至2008年经济危机前的水平。

供应链重构对基础设施提出新要求

我国对外工程承包企业“走出去”40余年,无论在市场开拓还是在工程能力上已经形成了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后疫情时代全球经贸合作将出现趋势性的变化,中国疫情防范措施的有效性和经济的率先复苏将作为自身发展创造更多有利的条件,但贸易保护主义使得国际形势更为复杂,中国的工程承包企业可能受到更多的外部关注。面对疫情给全球经贸合作带来的长远影响,应把握变化的特点和机会,减少受到的负面

冲击,进一步提升自身竞争力。

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中,一些欧洲国家因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而陷入严重的债务危机。为应对此次疫情带来的危机,也可能透支各国政府未来财富,影响其未来开展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能力。

疫情发生以来,多数国家采取封锁和扶持相结合的方式,尽量降低疫情扩散速度,同时为受疫情冲击的企业提供包括税收减免和财政支持在内的各种支持。但经济下行时期,政府的财力承受更大压力,在税收减少的情况下,只能依赖债务。伴随债务的增加,政府融资成本显著提高,投入基础设施建设的政府资金明显下降。同时,疫情冲击下,经济活动明显放缓,政府对扩大基础设施建设以满足经济发展需求的预期调低,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相关建设的资金投入规模。面对财源压力,一些国家采取更多市场化举措,将原本由政府包揽的部分公共用品和服务交给市场,通过包括BOT和PPP等在内的方式,为工程企业的发展提供更多机会。也应该看到,此类公共产品和服务往往不可能完全以业务利润为行为导向,可能会要求企业承担保护有效供给和市场竞争力,以及保障普遍服务等基本义务。

发展中国家与传统制造业相关的工业建筑需求增加,带动相关能源、交通、通讯等工程市场。历史经验表明,经济危机后国际贸易往往成为率先复苏的经济活动。伴随限制性措施的逐渐减弱,产业链的协同需求逐渐增强,为上下游的参与带来更多机会。与发达经济体服务业是经济主要动力相比,发展中经济体的产业结构中以制造业为主,不仅通过出口满足其他国家的市场需求,也为本国经济建设提供支持。传统和一般制造业将成为各国应对风险与谋求发展的重点,以尽快从危机

的冲击中恢复。但制造业的发展不仅需要稳定的政治环境,还对相关生产要素的高效、持续供应,以及产业链上下游配合有着更高要求。中国工程承包企业在工业类基础设施建设上拥有丰富的经验,具备低成本和高效的施工能力,能够对对和处理好各种复杂的外部情况,若能够与中国制造企业全球化布局的需求相结合,有效发挥工程承包优势,将为东道国和企业自身都带来更强的发展动力。

病毒的传播在人员流动受控后,由物品为载体传播也被各方更多关注。跨国物流核验、可追踪(贵)需求增加,贸易节点间信息区域网络建设市场增长潜力大。后疫情期,在现有的国际网络上增加防控能力、信息传播和协作能力的需求可能更为强烈,由此产生的对现有海关检验检疫和电子数据交换网络建设的工程可能增加。后疫情期,无法采取相应检验检疫措施的地区和公共卫生管理能力较弱的国家,与外界开展国际贸易可能需要承担更高的验证成本,需求推动的改进相应基础设施的愿望可能更为迫切。新冠疫情将促进各国开展公共卫生领域的相互协同,在现有其他传染性疾病预防,以及未来可能出现出现的其他公共卫生领域危机防控方面开展更快速和有效的合作。为了便利各类生产要素的流动,病毒检测设施建设也需要与国内市场流通的网络相匹配,成为公共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跨国航空客运缓慢恢复,中国国内超大规模市场催生通用航空市场需求有望快速增长。作为疫情下受冲击最为直接的行业领域之一,航空业面临的挑战巨大,客运尤为明显。但处于经济合作、生活娱乐等各类需求中心的航空运输可能在疫情逐渐受控后快速恢复。作为全球化的重要支撑方式,航空运输的作用难以被替代。同时,中国经济双循

环发展的格局为国内航空运输带来利好。对比美国的经济发展历程,航空运输可能是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重要支撑,除客运和货邮运输外,通用航空机场等基础设施有望获得较大的发展支持。机场的建设将带来能源保障、航空器维修、大修和保养、仓储物流等配套服务需求的快速增加,也会对现有的航空网络布局带来调整 and 优化的影响。航空运输的发展,对现有的铁路、公路运输可能形成竞争或合作关系,对各类相关的工程承包业务都可能产生连锁反应,带来的机会和挑战需要提前做好准备。

适应数字经济发展需求的工业互联网、智慧城市等基建创新、升级需求快速增长,数字安全对基础设施要求提高。数字经济所提倡的“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对现有的经济运行方式及支持其发展的基础设施带来重要利好。除了新建的信息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外,对现有硬件基础设施的信息化改造,以5G技术支持的物联网发展,将为提升经济运行效率创造无限可能。需求变化推动供给创新,相应监管政策的逐步完善会带来更多的市场机会。环境主要发达国家,对于数字经济都予以高度重视,一方面努力增强自身在相关技术领域的领先优势,推动相关企业在竞争中获得更高利润,一方面也将数字经济所带来的国家安全风险作为优先应对事项,采取各类措施加以限制。工程承包企业在参与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仅可能拥有更多的机会,也可能因此受到更多的关注和限制。因此,企业需切实增强自身对于相关技术的使用能力,关注各国政策限制和要求,积极通过管理流程改进,加强合规的理念和实际做法,减少因为不了解或缺乏足够能力而将自身置于较为被动地位的可能性。

(商务部研究院)